

馬來西亞福佬人和客家人的關係探析： 以檳城美湖水長華人義山墓碑為考察中心

陳愛梅*

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這篇論文主要使用華人義山墓碑的資料，建構馬來西亞檳城的地方史。研究者在2015年4月針對「美湖水長華人義山」進行全面性調查，發現有碑記的墓碑413個，其中339個可辨識其籍貫，74個無籍貫，或無法辨識；63個沒有墓碑。結合檔案、報章、僑批、神祖牌和口述歷史等，這篇論文探討美湖福佬人或客家人的昔與今，並分析同地緣群體械鬥的原因，認為方言群的差異並不是造成敵對的原因，美湖村的結盟是以同祖系的宗族為核心，再擴大到同姓氏且同地緣。這篇論文使用地當人的認知，結合到中國原鄉的考證，將美湖的「海陸豐話」歸為潮語系。在缺乏菁英領導，沒有宗祠或會館的鄉區展開歷史的探索和次族群互動的研究是困難的，這篇論文嘗試向這類研究投石問路。

關鍵詞：義山、墓碑、海陸豐、客家

* E-mail: tanab@utar.edu.my

投稿日期：2017年2月9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7年7月10日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klo and Hakka in Malaysia: A Study of Tombstones in Gertak Sanggul and Tanjong Asam Chinese Cemeteries in Penang

Ai Boay Tan *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Penang by utilizing epigraphical materials in Chinese cemeteries in Tanjong Asam. The Chinese cemeteries in Gertak Sanggul and Tanjong Asam were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d during April 2015. In addition to tombstones, British official records, newspapers, *Qiaopi* (letters from China), ancestral tables, and oral histories were studied to reveal the history of Hoklo and Hakka people in Gertak Sanggul. The paper uncovers the history of Hoklo and Hakka in Gertak Sanggul and analyzes the rivalry between people who came from the same area of China.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cl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 This alliance extended to people with the same surname and who came from the same area. Interestingly, different dialects did not create hostility.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ethnic subgroups in rural areas where the elite leadership and *huiguan* are absent.

Keywords: Cemetery, Tombstones, Hakka, Hoklo

* Date of Submission: February 9, 2017

Accepted Date: July 10, 2017

一、前言

這篇論文主要是以墓碑資料，探析福佬語系的海陸豐人和客家人在馬來西亞的關係。墓碑的調查地點是馬來西亞檳城西南區的美湖水長華人義山。2015年4月份，筆者在美湖水長華人義山進行全面的墓碑調查工作。這篇論文主要從墓碑資料，結合檔案、報章、僑批和口述歷史等，探析馬來西亞福佬人和客家人的關係，並回答數個美湖村的歷史問題：一、最早的方言群體是福佬人還是客家人居多？二、美湖海陸豐人之間的怨懟是否因方言群的差異而引起？三、海陸豐或客家，誰才是美湖最大的次族群？

在學院派的史學家將焦點從官方檔案轉向墓碑研究前，馬新華民間學者如莊欽永、張少寬、李永球等已以用行腳方式，在荒郊野外收集碑墓一手資料。近十年來，墓碑研究獲得學院派學者的關注，如黃文斌（2013）、古燕秋（2014）和白偉權（2015）等。由黃子堅教授所領導的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中心近年來也進行華人義山研究，尤其是到吉隆坡福建義山進行墓碑等資料收集的工作，成果頗豐富。李錦興討論英殖民時期政府對華人義山的管理（Lee 2016）；黃子堅也以17至19世紀的三個義山，說明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形成（Wong 2016）。北京的宋燕鵬利用吉隆坡福建義山墓碑資料，與馬來亞大學的潘碧華和潘碧絲聯名，先後發表了兩篇籍貫相關的研究成果（宋燕鵬、潘碧華 2014；宋燕鵬、潘碧絲 2017）。

論及馬來西亞碑銘的研究，不得不提饒宗頤和傅吾康。傅吾康及陳

鐵凡合編的《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是治馬來西亞華人史，尤其是檳城華人史的重要參考書。不過，《銘刻萃編》對檳城西南區的關注甚少。范立言主編的《馬來西亞華人義山資源彙編》也沒有關注檳城西南區的義山。（范立言 2000）這篇論文主要是以檳城西南區的美湖水長華人義山墓碑為研究，這些資料未獲得學界的關注。陳愛梅針對美湖的海陸豐社群（陳愛梅 2015）、傳統信仰（陳愛梅 2016）和大伯公信仰（陳愛梅 2017）發表了三篇論文，但她在論文中並沒有使用這些墓碑資料。

台灣客家研究的興起某種程度催化了馬來西亞的客家認同和研究，檳城西南區，尤其是浮羅山背（Balik Pulau）獲得本地及海外學者、客家社團領袖和媒體的關注。¹檳榔嶼分兩個縣，即東北縣和西南縣。浮羅山背是西南縣的行政中心。由於山區阻隔，美湖距離浮羅山背市山心約 15 公里車程；從美湖翻越山脈，行走山路約 7 公里就可抵達浮羅勿洞（Pulau Betong）。檳榔西南海岸綫的山區中，有一小片平地，即美湖。結合當地田野訪談和墓碑研究，這篇論文主要討論福佬語系的海陸豐人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以建構這個村子的歷史，和次族群間的結盟關係。

二、定義和簡介

「海陸豐」，即海陸和陸豐兩個縣，是中國少數以兩個縣為通稱的區域，如同兩廣，實指廣東和廣西。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長樂、

¹ 在台灣學者到馬來西亞進行客家研究前，外國和馬來西亞的本地學者已在關注馬來西亞的客家研究。不過，台灣客家學者的到來帶動了客家研究的潮流，客家領袖也以此替自己的地位增值。（陳愛梅 2017）

興甯劃歸嘉應州，惠州府轄九縣一州，即「惠州十屬」。「惠州十屬」的劃分一直持續到清朝覆滅。檳城惠州會館供奉神祖牌神龕兩旁，高掛「惠博和平喜見龍河浮西須西旭日，紫連長久欣聞海陸慶豐年」。這對聯合蓋了惠州十屬，上聯有五屬，即：1、惠（陽）；2、博（羅）；3、和平；4、龍（川）和 5、河（源）；下聯則有另外五屬，那就是：6、紫（金）；7、連（平）；8、海（豐）；9、陸（豐）和 10、（新）豐。

台灣客家話強調內部的區分，如四縣、海陸、大埔、舖平和詔安等等腔調（鍾榮富 2014：30）。不過，就馬來西亞而言，並不是所有海陸豐人是客語系的次族群。海豐境內約 80% 的人說海豐話，陸豐話則是陸豐市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方言。由於地緣關係，陸豐市東部受到潮州話的影響，東部的一些地區則完全通行潮州話。通行於海豐陸豐的方言又被稱為海陸豐話，或福佬話。當地有部份客家人則使用客家話，這些客家主要分佈陸河縣。陸河縣是在 1988 年從陸豐縣分出。同年，海豐縣、陸豐縣及陸河縣劃為廣東省汕尾市。但由於這區域自清朝以後都是屬於惠州府所管轄，所以海陸豐人的後代仍視惠州為祖籍地。馬來西亞其他地方的海陸豐人，仍參加惠州會館。馬來西亞只有一間海陸會館，位於森美蘭芙蓉。這篇論文採取檳城美湖本地人的觀點，將「海陸豐話」視為福佬話，與潮州話相似，這和台灣對客語分類的「海陸豐腔」不同。

籍貫一詞的原意是指一個人出生或祖居的地方。（宋燕鵬 2017：25）第一代移民在墓碑上刻寫籍貫，那是對出生或成長地的懷念。在海外出生的華人墓碑上依刻上籍貫，那是對祖籍之地的認同。在一般的籍貫研究中，墓碑或神祖牌上的「惠州」是指惠州市，位於惠陽縣，如同寫「福州」指是福州市，而不是指福州十邑之福清等。1913 年，歸善

縣方改稱惠陽縣。「惠邑」可以指「惠州」或「惠陽」，而惠州一般認為是指惠陽的惠州市，故本文將惠邑和惠陽歸為同一類。

落實在民間，籍貫運用卻不如學理般那麼清楚，如美湖義山「亞盛陳公」，卒於日據時期，其碑墓上刻「惠州」；其妻「盧氏陳媽」卒於1955年，墓碑上則刻「陸邑」。據陳亞盛的孫女漢姐表示，他們都是陸豐人，講海陸豐話，並出示一封來自陸豐親人的僑批。這篇文章將這個例子視為特例，在統計中將其歸為陸豐。如雖然惠州市主要以客家話為主，但由於美湖的墓碑上刻「惠州」或「惠邑」的包含福佬語系的陸豐人，所以本文不將「惠州」或「惠邑」歸類為客家。

美湖（Gertak Sanggul）（圖一），稱舊尾湖，是一座自然形成的華人聚落，這與馬來亞大部份在緊急時期 (Emergency) 成立的華人新村不同。1820年的檳榔嶼地圖，已標示了「Tullo Gurtasanggul Bay」的海灣。²到了1853年，「Tanjong Gertak Sanggul」已標示在簡略的檳榔嶼地圖中。19世紀60年代以前，廣東省移民已在美湖或及鄰近的山區形成聚落。美湖住戶的遷移主要分為三個梯次：一、老住戶，二戰前就已定居下來，海陸豐人居住在沿海，主要從事捕魚行業；客家人則住在山區，主要從事種植業；還有少數的福建人（閩南）和龍巖人，主要從事商業活動；二、「外來戶」，20世紀70年代遷入，從事養豬業，少於十家；三「新戶」，居住在廿一世紀成立的新住宅區，是由政府所建的廉價組屋和私人界發展的獨立洋房所組成。根據美湖鄉村發展委員會在2015年的調查，美湖村462戶人家，村民約1,100人，華人占了72%；

2 Plan of Prince of Wales land and the territories ceded thereto on the opposite shore as survey and drawn under the directions and the orders of The Honorable William Edward Philips Govt. in 1820.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典藏號 P.48.

馬來人則是 26%。政府所建的廉價組屋以馬來人居多，且入住率偏低。美湖村裡有一間華文小學，一間回教祈禱室，九間廟宇，主祀清水祖師的廣福宮是全村最大的廟宇，此外，村裡尚有聖人宮、玄龍宮、拿卓公邦利馬依淡、海墘大伯公、哪咩公、梨山宮、土陰殿和村口的妙音堂等。（陳愛梅 2016）

水長（Tanjong Asam）（圖 1），美湖東邊的一個小聚落，距離美湖村約 2.6 公里。水長只有 10 戶人家，原來全是客家人，不過近年有 2 戶福建人入住，一戶是客家老板將屋子讓給福建籍工人；另一戶則是客家女兒帶入福建女婿。這 10 戶當中有 3 戶是廖，赤溪客家人。³水長入口有一座福德正神廟，當地人稱大伯公廟。20 世紀 90 年代，水長修繕大伯公廟。由於這小小的客家聚落並不見何任碑刻或檔案記錄，所以聚落的形成歷史不詳。

3 訪問廖就金，於 2016 年 8 月 28 日，水長。



圖 1 檳城美湖和水長位置圖

資料來源：中文地名標示自谷歌地圖。

美湖水長華人義山，距離美湖村遠 2.7 公里，毗連水長聚落。這個義山的墳地主要分為兩區，即靠海的老墓區，和山坡上的新墓區，兩區以馬路隔開。最早的墓碑坐落在老墓區，「同治戊辰年吉春吉旦立（1868）」，名為「公把大灣」的「廣東墳地」（圖 2）。因此，這個義山也可視為廣東義山，早年，美湖和水長的福建省人是不可以埋葬在這裡。近年來義山管理委員會雖對原籍廣東省以外的村民開放，但埋葬在這裡的非廣東省人少於於 1%。越過馬路，就是建立在山坡上的新墓

區。民國十九年（1930），人們在新墓區的重修「義塚古老先人墓」（圖三）。「古老先人」另稱「古老大人」、「古老仙人」、「有緣公」等，埋葬無主骨骸的義塚性質相同（張永明 2015：138）。20 世紀 30 年代，人們給客死異鄉者修整大墓。

目前，美湖水長華人義山原則上只允許美湖和水長居民過世後埋葬，且僅需繳象徵性收費：單穴馬幣三百元、雙穴馬幣六百元。⁴由於義山的封閉性，所以是研究地方史的絕佳材料。這個義山是由理事會所管理，共有 11 名成員，僅有一個名額保留給水長居民，其餘的全是美湖人。



圖 2 同治戊辰年（1868）的總墳，位於海邊老墓區

資料來源：楊育珊攝於 2015 年 4 月 5 日。

4 訪問張偉嶸，美湖水長華人義山主席，於 2016 年 8 月 28 日，美湖。



圖 3 民國十九年（1930）重修的總墳，位於山坡的新墓區。

資料來源：楊育珊攝於 2015 年 4 月 5 日。

三、清朝：客家與潮語 / 福佬語系次族群孰眾？

自英殖民始，馬來亞華人就被劃分為五大方言群，即廣東、福建、潮州、客家和海南。海峽僑生、福清、福州、潮州客和興化等，都在不同年代的人口普查中出現。「海陸豐」在人口普查中不被視為獨立的一支。如前文所述，本文採取當地人對「海陸豐話」的認知，即福佬話。福佬話與潮語相似性高，筆者也見過福佬人在身份證上填寫「潮州」，因此，這篇文章將「潮語」和「福佬語」視為同一類方言。

移民初期，哪個方言群的人口最多？美湖水長華人義山的墓碑資料可提供綫索。

2015年4月，筆者帶領拉曼大學中文系學生到美湖水長華人義山進行墓碑的調查工作。⁵ 學生兩人一組，每一組負責不同的區域。研究團隊花最多的時間在辨識墓碑上斑剝的文字。

根據2015年4月份的調查（見表1），美湖水長義山有碑記的墓碑共有413個（不含老墓區的總墳和新墓區的「義塚古老先人墓」），其中339個可辨識其籍貫，74個沒寫籍貫，或無法辨識。此外，63個沒有墓碑，僅以土堆記，或在坟前留下祭拜的痕跡。

表1 美湖水長義山調查

有碑記		無碑記
籍貫	無籍貫或無法辨識	
339	74	63

資料來源：彙整碑墓資料。

如前段所述，老墓區最早的墓碑是同治戊辰年（1868）的總墳（圖2），這區的墓碑多已倒塌或半埋在泥土中，只有少數的墳墓尚有後人在祭拜。在可辨識的24個清代墓碑中，95%來自老墓區。

哪個方言群是這個區域最早且數量最多的落腳戶，這也只能從老墓區去尋找線索了。

可辨識性別的清朝墓只有25個，皆是單穴墓，當中有16個是男性，女性只有5個，4個無法辨別。換言之，當時男女比率是100:31.25。女性墓碑上刻的籍貫有陸邑(2)、惠州(1)、河邑(1)和增邑(1)。根據1891年和1901年的檳城人口統計，在100個男性中，分別有31.7和40.1的

⁵ 參與這項工作的拉曼大學中文系學生有陳昭慧、黃友亮、楊育珊、曾婉兒、廖嘉儀，以及檳城人王書偉。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宋燕鵬博士的義務協助，他在現場幫忙辨識文字，尤其是清朝的墓碑。

女性，（黃賢強 2008:120）這數據與碑墓的男女比率是接近的。根據女性的墓碑，推論當時已有家戶在這裡定居，而陸邑的比率最高。

表 2 美湖水長華人義山清朝碑主之籍貫

方言	客語系						潮語系					不詳	
	地區	惠州	嘉應	揭邑	增邑	河婆	河邑	普邑	寧邑	陸邑	海豐		海陸
數量	2	2	1	1	1	1	1	2	5	1	1	4	1

資料來源：彙整碑墓資料。

在 25 個清朝墓碑中，可辨識籍貫的有 23 個。表 2 所示是清朝墓碑上可辨識之碑主籍貫，客語系和潮語系之墓主孰眾？這項具挑戰的問題。家邑是在什麼地方？筆者至今尚未解，故暫且不論。參照今日美湖地區籍貫與方言群的關係，本文將惠州、嘉應、揭邑、增邑、河婆和河邑之歸為客語系人，總數有 8 人。潮語系的籍貫有潮邑、普邑和寧邑，共計 7 人。惠海陸和陸邑籍貫方言群是複雜的，可屬於客語系，亦可是福佬語系。美湖村裡的陸豐人，尤其是姓陳的，目前所悉，全是屬福佬語系之。除了陳姓，美湖其他姓氏海陸豐之后裔表示他們的祖先是說海陸豐話，即福佬語。因此，本文都將海陸邑之加入潮語系，數目為 14 人。惠州一般指惠陽，但根據田野調查所得之資料，也有福佬語系的陸豐人在墓碑上刻惠州，所以，本文不將惠州歸屬於哪種方言群。雖然如此，既使將惠州歸為客語系，潮語系的比率還是最高。

根據墓碑的資料，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美湖最大的方言群體是潮語系的移民，客家人次之。斑剝的清朝墓碑透露接下來半個世紀的發展。5 個陸邑的墓碑中，3 個可辨識其姓氏，皆與陳姓有關，除了一個是男性，另外兩個是女性，一個是陳門；另一個是陳氏。清末時期，陳

姓陸豐在美湖的勢力已見端倪！

四、海陸豐的怨懟：方言群的差異？

美湖的海陸豐人之間，經歷敵對時期。其他姓氏（「雜姓」）的海陸豐人結盟，以對抗在人數上占優勢的陳姓海陸豐。「雜姓」海陸豐人和陳姓海陸豐人的對立，是方言的差異所造成的嗎？本文從這兩支敵對的派別本質，和客家人的態度進行論述。

美湖的陳姓海陸豐人，主要來自陸豐上陳村，福佬語的單姓村。

「恁是尾湖過來的！阮鄉里很多人都過番到尾湖。聽說那邊討海的。」2014年10月份，筆者到訪陸豐上陳村，村裡的老人得知客從美湖（尾湖）來，熱情且親匿，這些老人當中，有些連美湖是哪個國家也不清楚，但都知道美湖有很多「鄉里人」。

陸豐上陳村，人口一萬餘人。根據民國元年（1912）的記錄，始祖崇德公從福建興化府莆田，帶二子一侄，遷至廣東陸豐上陳。（其燊（主編）2001：3、22）。長子葬飛鳥埔，故曰飛鳥房；次子壽山公葬在傳說葬吊燈籠山，壽山公石碑記載生三子：南園、北園和東園（其燊（主編）2001：45-46）。現在居住在上陳村的，百份之九十五以上是屬北園房。傳到第九世，分五大房，沿用至今。

上陳村人出洋史實不可考。美湖義山有三個刻「上陳」的墓碑，其中兩個是1921年之墓。在此之前，他們已這在美湖定居，或是跟隨清朝陳姓墓主的腳步遷移至美湖。他們人數越來越多，群居在美湖東邊的平原，成為美湖最有勢力的群體。於此同時，美湖村也有其他姓氏的海

陸豐社群，他們聯合起來以抵達陳姓陸豐人。

陳姓和雜姓海陸豐人的仇敵，美湖老人記憶尚存。客家人賴先生（1933- ）說，他曾聽家裡的長輩談起，雜姓海陸豐人有兩支槍械，但他們從沒用來對付陳姓陸豐人，因為擔心子彈用光後會被人口占優勢的陳姓陸豐人屠殺。（陳愛梅 2015：94）

美湖水長義山的墓碑顯示（表 3），陳姓陸豐人數比雜姓之多一倍以上。在 20 世紀 30 年代或更早就隨父母遷居到美湖的陳利鐘表示，這個村子曾一度幾乎每家皆來自陸豐上陳村，是同鄉兼同一祖系之親人。（王琛發 2003：116）墓碑資料支持陳利鐘的論述。25 個陳姓陸豐墓碑刻上他們的輩份或代，介於第十五世和十八世之間。⁶相較之下，「雜姓」的海陸豐墓碑中，只有兩個刻上代或輩份。年長，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的陳姓陸豐人對自己的輩份很清楚，例如，陳利鐘，上陳村大房支脈，要求后代按輩份稱呼村裡的親戚。不過，這種親屬稱呼也僅限同屬大房支脈，另四房支派之就不在此例。

表 3 美湖水長義山陳姓和「雜姓」海陸豐人墓主

姓氏	陳		「雜姓」	
	男（陳公）	女（陳門）	男（「雜」公）	女（「雜」門）
數量	41	26	19	10

資料來源：彙整碑墓資料。

由於資料的匱乏，我們無法確實知道海陸豐人什麼時候開始停止械鬥。至少 1937 年中日戰爆發後，中國人的概念甚於姓氏或幫派，他們聚在一堂共同為中國籌款。1937 年 8 月份的《星洲日報》刊登一則新聞：

6 遷移到美湖的上陳村人的最長的輩份應是第十四，名為陳馮伯，但由於墓碑上沒有刻上陸豐，所以不計。

美湖埠，屬檳島一小區，該處華僑昨假培英學校禮堂開僑眾會議，主席劉文彬報告救振國內災區難民理由畢，決議成立美湖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正主席王吉章，副主席陳質材，財政羅生記……。當場自動捐獻者，王吉章二十元，羅生吉十元，廖觀龍十元……。（不著撰人 1937）

擔任籌賑會主席以及樂捐榜首的王吉章是龍巖人；捐贈數額排名第二的都是客家人，羅生吉，惠州客和水長的廖觀龍，赤溪客。陳姓之陸豐人並不富裕。據村裡的老人表示，當時街上經營雜貨生意和剪頭髮的都是福建人。美湖的大街位於東區，當時福建人與陳姓海陸豐人應處得不錯，今日大街上一間龍巖人的住家的神龕上供奉著不同姓氏的神祖牌，除了屋主本姓的「太原堂」外，還有「穎川堂」。「穎川堂」內有兩個神祖牌，一個是「亞普陳府大公」，另一是海豐的陳公。龍岩人屋主他們稱為「厝主公」，推論這是沒有子嗣的陳姓海豐人，將房子給了龍巖人，該戶龍巖人繼續供奉其神主。東區陳姓主要是上陳村人的聚集地，「厝主公」雖非來自同一個宗族，推論其姓氏使他被勢力龐大的上陳村移民接納。

陳姓海陸豐和雜姓海陸豐雖然放下武器，但怨懟未解。陳姓陸豐和雜姓海陸豐人既使相愛也不能結婚。陳姓陸豐人和雜姓海陸豐曾發誓不相往來，發誓之事在土地埋下十三個碗。後來他們講和了，土里卻只挖出十二個碗。一個碗不見了，這表示村裡都會出現一個瘋子。（陳愛梅 2015：97）怨懟的原因不詳，只留下帶有神話色彩的傳說。

美湖的陳姓和雜姓海陸豐人的械鬥、怨對是因為方言群的差別？筆者向美湖村陳姓和「雜姓」陸豐人後后代求證，他們多數表示祖先是講海陸豐話，如飯鍋叫「鍋頭」，嬰兒叫「赤虾仔」。說著同樣福佬話的兩幫人馬敵對的原因不詳，客家偏安於山區山邊，採取不介入的態度。雖然如此，勢力強大的陳姓陸豐人還是會乘勢入侵山區，占點便宜，例如，到客家人的榴槿園偷榴槿。客家園主出來驅趕，陳姓陸豐盜賊還威嚇客家園主：有種別下山！

美湖的陳姓海陸豐人主要來自同一祖系，他們居住在美湖東邊，聯合起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其他非同祖系的海陸豐陳姓人也只能往這個集團靠攏。雜姓海陸豐人只能團結起來，以免受到陳姓海陸豐人的欺負。方言的差異並不是造成海陸豐之間敵對的原因。宗族的凝聚力比地域之來得強大。

五、海陸豐的優勢與客家的邊緣？

美湖村常與與海陸豐畫上等號，且以兇悍聞名。20世紀50年代，陳姓陸豐人在村裡釀私酒，警察入村捉拿，陳姓陸豐人將警察打得抬著出去。入贅陸豐陳門的吳老先生表示，他未到這村子時就聽聞海陸豐的兇悍，連警察都不敢進來。隨妻居住在陳姓陸豐大本營的吳先生與鄰里和平相處。以男性為主的宗族觀，在南洋檳榔嶼的小漁村產生變化，陳姓陸豐的丈夫、女兒等，後來都居在原屬陳姓陸豐聚集的區域。

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爆發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種族沖突。美湖村以華人居多，他們向來與村裡的馬來人和平共處，互不攻擊。雖然

如此，年輕的美湖華人村民輪流守在村口，以防遭外來的突擊。四、五公里外的公芭，是一座以馬來人為主的小鎮，公芭的華人都逃到美湖尋求庇護。不管是認識，或不認識的，美湖華人都打開門戶，收留公芭華人。在這時候，「華人」的身份甚於宗族或地緣的差異。種族關係劍拔弩張的時代，美湖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攻擊。鄰鎮的地方領袖拿督蔡瑞光談起五一三種族沖突，表示大概是因為美湖的海陸豐以兇悍聞名，所以沒受到攻擊。⁷

「美湖海陸豐人兇悍」的傳聞，至少持續到 20 世紀 70 年代。吳老先生的女兒回憶起在浮羅山背聖心中學念書的歲月，她的同學跟她說，家人不讓她到美湖，因為美湖的海陸豐人很兇。20 世紀 70 年代，隨著新移民的遷入，稀釋了美湖海陸豐人的比率。居住在山區西邊的客家人人數也在增長。海陸豐人和客家人，誰才是美湖的最大次族群？

美湖是惠州的大本營。20 世紀 7、80 年代，檳城喬治市的惠州會館內部發生鬥爭，美湖惠州人的態度尤為關鍵。鬥爭的一方還特派專車載送美湖惠州人去投票。美湖水長華人義山的墓碑資料也證明，美湖人當中，以祖籍惠州者的比率最高。

7 訪問蔡瑞光（1947-），2014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6.30 至 7.30，於他在峇眼的住家。

表 4 美湖水長華人義山來自惠州十屬的墓碑區域分佈和數量

		地區與數量	小計
惠州十屬	歸善（今惠陽）	惠陽 (4); 惠州／惠邑 40; 白花上坑鄉 (1)	45
	博羅	無	0
	海豐	海豐 (5)	8
	陸豐／陸邑	上陳／上陳鄉 (3); 旱田鄉 (1); 陸豐／陸邑 (81)	85
	河源	無	0
	龍川	龍邑 (1)	1
	永安（今紫金）	無	0
	和平	無	0
	連平	無	0
	新豐	無	0
	其他	海陸 (1)	1
總計			140

資料來源：彙整碑墓資料。

表 4 所示，屬於「惠州十屬」的墓碑有 140 個，占據總墓碑的 38%。在「惠州十屬」中，又以陸豐者居多，刻上「惠州」或「惠邑」者次之。在 339 個可辨識的墓碑中，140 個是來自惠州十屬，這表示，惠州十屬的人在美湖占據近乎 41%。當中，屬海陸豐的占了惠州的 60.7%。換言之，在美湖水長華人義山，每四個可辨識的墓碑中，就有一個是海陸豐之。

20 世紀 80 年代成長的美湖人，幾乎都聽得懂客家話。美湖客語系人居住在山邊、山區和西邊。西邊的客人主要由羅生記的家族所組成。羅生記來自是浮羅山背，早年經營豬肉生意，後來遷移到美湖，據說從事鴉片生意而發蹟。羅生記在 20 世紀 30 年代已相當富裕，他在 1937 年中日戰爭樂捐名列第二。在羅生記遷入美湖前，這村子已有客家人。尚有後人祭拜的客家墳墓是宣統年間的「亞南賴公」，揭邑客家人，他

們已在美湖繁衍第五代，目前還是以客語為家庭用語。

客家人是否是美湖最大的次族群？

由於客家並不能與地域畫上等號。如前段所述，美湖的惠州並無法等於客家人，因此，本文不將惠州歸納入客語系次族群。本文將赤溪、揭陽、增城、豐順、河婆、龍川、嘉應和河源的墓主歸為客家人。

表 5：美湖水長義山客語系碑墓和數量

籍貫	赤溪	揭陽	增城	豐順	河婆	龍川	嘉應	河源	梅邑
數量	24	26	3	25	12	2	3	1	1

資料來源：彙整碑墓資料。

美湖水長義山屬於客語系的墓碑有 97 個，比海陸豐之多出 12 個。赤溪、揭陽和豐順的墓碑各有 20 餘個；河婆 12 個；增城、龍川、梅邑和嘉應的數量非常少，只有 1 至 3 個。

美湖水長義山客語系的墓碑比福佬語系的多，這是因為這個義山的埋葬者還包括隔壁水長，百份百的客家村。在 1937 年中日戰爭樂捐中也是名列第二的廖觀龍是赤溪客，水長 10 戶中有 3 戶是他的后代。24 個赤溪的墓碑中，有 15 個是姓廖，或屬或廖門。扣除這 15 個墓碑，客語系的墓碑是 82 個，略比海陸豐之少。

陳姓陸豐曾是美湖最大的勢力，第一代移民携妻帶子到南洋落腳，雖然沒有建立祠堂，但他們以聚集在一起，保護自身的利益。當孩子長大成人後，由於具同姓不婚的概念，他們需往外尋找婚配對象。美湖地理位置封閉，加上對其他姓氏海陸豐的敵對，他們會尋找村裡的客家女性成親。例如，西邊羅生記的長女就嫁給了東邊陸豐的陳利鐘。不過，

與客家結婚親對擴張陳姓陸豐的勢力並沒有明顯的助益。

傾倒的墓碑顯露幾份荒涼。在美湖成家有子嗣者，會負責祭拜無子嗣之直系親屬。陳利鐘童年隨父母以及叔伯從陸豐上陳村幾番輾轉遷到美湖，他的大伯父早逝，叔父携大伯母和年幼的侄兒們回到上陳村，大伯公的墳墓則由陳利鐘及其後代祭拜。陳利鐘的弟弟壯年未娶親就去世了，葬在老墓區，也是由陳利鐘和其後代祭拜。

不過，對於非直系親屬，情況就不一樣了。陳利鐘在世時，每年的清明他會多準備三份祭品，祭拜自己的直系親屬後，他帶著三份祭品神秘地離開了。他不讓子孫跟隨，並表示拜祭到他這一代就結束了，後人不必再拜。陳利鐘過世約十年後，這項調查展開時，宋燕鵬博士在荒草中發現了三塊完全傾倒的「上陳村」墓碑，後來經口述歷史的查證，才知道這是陳利鐘在世時神秘祭拜的「三公」。

從清朝到現在，美湖村面對數次移民者的遷入，但海陸豐人依是美湖村裡最大的次族群。

六、小結

墓碑是研究華人歷史的重要史料，但墓碑收集工作和解讀並不簡單。墓碑雖被視為「一手資料」（primary sources），但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一些特殊的狀況中，口述歷史和僑批等資料同樣具說服力。例如，漢姐籍貫的問題，墓碑上雖是寫「惠州」，一般認知中的陽惠，但實際上是陸豐，她出示的僑批和口述歷史雙重證據證明之。檳城的歷史研究甚稱豐富，墓碑獲得史學家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關注，但

尚未見專門對一個義山進行全面性調查的成果。由於美湖水長義山的封閉性，及範圍不大，既使在有限的資源下也可進行全面性的調查。

墓碑的調查研究解決幾個問題：美湖與客家人為主的浮羅山背一山之隔，客家人雖在清朝已進入美湖，但村裡最大的次族群是潮語系者，而非客家人。雖然美湖歷經數波的移民潮，但潮語系的海陸豐人仍然是美湖最大的次族群，因此不能將美湖視為客家聚落。雖然海陸豐腔被視為台灣客語的腔調之一，但並不是所有海外的海陸豐人都是客家人，檳城美湖的例子尤為明顯。

此外，墓碑研究也檢證了陳姓海陸豐人的數目遠勝雜姓海陸豐人，為口耳相傳中，數量上占優勢的陳姓海陸豐人找到了歷史的憑證。兩幫海陸豐人的鬥爭似乎與方言群的差異無關。陸豐上陳村人因同祖系而結盟，其他陳姓海陸豐人加入了這個集團，以尋求保護。其他姓氏的海陸豐人，雖然和陳姓海陸豐人亦有地緣之親，但他們之間還是發生沖突。「雜姓」海陸豐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夠抵抗陳姓陸豐的勢力。客家人採取觀望與遠離的態度。海陸豐人和客家人雖然有方言上的差異，但由於居住的地方不同，客家人主要住在山區，不會對居住在平原的海陸豐社群造成資源的競爭，所以並沒有發生敵對。因此，本文提出，資源競爭所產生的沖突，比方言群的差異來得大。

可惜的是，美湖福建省人並沒有埋葬在這個義山。因此，我們無法從墓碑資料中得知福建社群歷史。他們在美湖是屬少數族群，比廣東系人較晚遷入美湖，因此義山之地已被廣東系人占據，福建人不被允許埋葬在此義山。不過，今日的義山已開放多美湖水長的所有華人居民，馬來西亞華人的籍貫意識已漸漸轉換成居住和成長的在地化認同。

在缺乏明確的菁英領導，沒有宗祠或會館的鄉區研究次族群間的關係是具挑戰的，雖然義山的墓碑研究可以回答不少的歷史問題，但還需其他資料的輔助，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地方史。

參考文獻

- 不著撰人，1937，〈南島吾鄉，側隱心激動下，到處有賑災聲：美湖〉
《星洲日報》，8月23日。
- 王琛發，2003，〈聚居美湖的福佬惠州人〉《檳城惠州會館180年：跨越三個世紀的拓殖史實》。檳城：檳城惠州會館出版。
- 白偉權，2015，《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雪蘭莪：新紀元學院。
- 古燕秋編著，2014，《死生契闊：吉隆坡廣東義山墓碑與圖文輯要》，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宋燕鵬、潘碧華，2014，〈20世紀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貫分佈：以吉隆坡福建義山收據為中心的考察〉《南洋問題研究》3：48-60。
- 宋燕鵬、潘碧絲，2017，〈生命回歸：東南亞華人籍貫與鄉土認同演變：以吉隆坡福建義山墓碑資料為考察中心〉，《哲學與文化》5：25-42。
- 范立言（主編），2000，《馬來西亞華人義山資源彙編》，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大會堂。
- 其燊（主編），2001，《陳氏族譜》。廣東省陸豐上陳鄉。

- 陳愛梅，2015，〈人類學實驗場的歷史研究：以檳城美湖海陸豐人研究為例（1900~1970）〉。頁 91-112，收錄於莊華興等編，《變遷中的馬來西亞與華人社會：2014 第二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論文集：社會與政治卷》。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_____，2016，〈廟宇、神明和乩童：馬來西亞檳城美湖華人傳統仰的傳承與轉變〉。頁 392-409，收錄於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研究報告：東南亞宗教的轉型與創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2017，〈客家的建構與想像：以馬來西亞檳城大伯公信仰和海陸豐社群為例〉《華僑華人文獻研究》4: 133-149。
- 黃文斌，2013，《馬六甲三寶山墓碑集錄（1614-1820）》，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黃賢強，2008，〈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張永明，2015，《南臺灣無祀信仰的衍化與變異：以內埔客庄無主骨骸奉祀風俗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榮富，2014，〈台灣客家話在地化現象之考察〉。《臺灣語文研究》1: 29-54。
- Wong, Danny Tze Ken, 2016, "Early Chinese Presence in Malaysia as Reflected by three Cemeteries (17th-19th c)." *Archipel* 92: 9-21.
- Lee, Kam Hing, 2016, "State Policy, Community Identity,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Cemeteries in Colonial Malaya." *Archipel* 92: 91-110.

Plan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and the territories ceded thereto on the opposite shore as survey and drawn under the directions and the orders of The Honorable William Edward Philips Govt. in 1820. Map of Penang, 吉隆坡：馬來西亞國假檔案局，典藏號 P. 48。

Wong, Danny Tze Ken, 2016, “Early Chinese Presence in Malaysia as Reflected by three Cemeteries (17th-19th c.).” *Archipel* 92: 9-21.